

杭州刺史白居易与浙籍名士顾况交谊渊源考

——从咸淳《临安志》的一则旧志指误说起

周祝伟

提 要：白居易与顾况在唐代诗歌史上均具有重要地位和影响，但彼此之间的交谊却长期隐而不彰。文章从4个方面揭示顾、白二人之间非同寻常的忘年交谊和深厚渊源。一是通过挖掘利用地方志中保存的新资料，实证白居易任职杭州刺史时曾以“行县”为名远赴杭、苏二州边境顾况家乡凭吊缅怀，揭示白居易对顾况的尊崇感恩心绪。二是通过考察顾况在两次诗坛盛事中的地位和影响，阐释顾况对青年白居易的激赏推誉之功。三是通过梳理比较顾、白二人文学主张和诗歌风格特点，阐明白居易与顾况在诗歌事业上的继承关系。四是通过分析白居易对顾况师友李泌治杭事业的弘扬，以及对顾门弟子皇甫湜的特殊情谊，从侧面进一步佐证白居易对顾况的深厚情谊。

关键词：唐代 白居易 顾况 交谊 地方志

有关白居易与浙籍名士顾况的交谊，自唐代以来文献记载隐而不彰，仅有始见载于唐张固《幽闲鼓吹》的青年白居易以歌诗谒顾况之事。此后，五代王定保《唐摭言》以及新、旧《唐书》等所载涉及顾、白交谊之事，也都仅限于此，且所述大同小异。学界因所依凭的资料有限，即便是白居易早年谒顾况一事，也颇多质疑，至今仍然聚讼纷纭，各执一词。一种观点认为，顾、白二人贞元四年（788）之前在时空上没有交集，两人没有在长安相见的可能，见载于《幽闲鼓吹》的白居易谒顾况一事仅是个故事传说，并不可信。^① 也有一种观点，虽认同白居易早年有谒顾况一事，但认为谒顾地点不是在长安，而可能是在饶州或苏州。^② 还有一种观点坚持认为《幽闲鼓吹》所载顾白这段诗坛佳话是可信的，并针对质疑点即顾白二人在长安是否具有时空交集的可能性问题重新作了不少考证工作，并取得了一些成果。^③ 笔者在翻检地方志时，发现浙江宋代以来的地方志书中所收录保存的资料表明，白居易在任杭州刺史时曾以“行县”之名，专程赴僻处杭、苏二州边地访故凭吊，追忆当年在长安向顾况请益论诗的情形，佐证了白居易与顾况之间的早年交往史实。本文即从南宋咸淳《临安志》指出旧志中所载盐官县“紫微山”得名之误为切入点，考察白居易任职杭州刺史时前往西山凭吊致意史实、顾况早年对白居易的激赏栽培、白居易对顾况诗歌事业的传承发扬，以及白居易对顾况师友的特殊情感，以揭示顾白之间的交谊渊源与深厚情谊。

① 参见王拾遗：《白居易传》，陕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1页；傅璇琮：《唐代诗人丛考》，中华书局，2003年，第418页；魏景波：《再议“长安居，大不易”》，《中国社会科学报》2023年12月8日，第7版。

② 参见万曼：《白居易传》，湖北人民出版社，1956年，第7页；朱金城：《白居易年谱》，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12页。

③ 参见许大畅：《白居易未仕前经历浅探》，《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第3期；周桂峰：《白居易事迹辨说三则》，《淮阳师范学院学报》1998年第4期。

一 杭州刺史白居易紫微山访故之行考实

南宋潜说友所撰咸淳《临安志》卷27《山川》“紫微山”条载：“紫微山，在（盐官）县东北六十里。旧志云：唐紫微舍人刘禹锡作刺史，行县至是山，望硤石湖，因名。今半山有碑，镌‘紫微山’三字。”^① 然后在其下加“按”语指出：“（刘）禹锡未尝为杭州刺史，惟白居易、裴夷直自中书舍人出守。旧志误也。”^② 这是现存历代方志中最早以纠误的形式提出白居易曾前往顾况家乡参谒可能性的问题线索。咸淳《临安志》的前志非佚即残，难以推知此“旧志”究竟是何志，但刘禹锡没有担任过杭州刺史这事却是确凿的。至于白居易、裴夷直二人，他们在出守杭州之前均有在中书省（曾改称紫微省）担任中书舍人的仕履，但裴夷直自开成五年（840）八月出贬杭州刺史，次年（会昌元年，841）三月即再贬欢州司户，在杭州任职仅短短的数月。^③ 更为关键的是，裴夷直出生于贞元三年（787），比白居易尚且小整整15岁，在他少年之时顾况早已遁世隐居于茅山，与顾况之间几无产生交集的可能。

紫微山，又名西山，高三十丈，周围一里，与东山对峙，故又名硤石。^④ 东山即沈山，两山之间，中通河流，溢而为湖，即硤石湖，“亦称峡川，……广三十二丈，……其源自茶湖，南通麻泾港，迤西南流入于洛塘河，东达海盐县界黄道湖”^⑤。紫微山南麓有惠力寺，旧名志愿寺，原为东晋尚书张延光故宅，宁康年间张延光舍宅为寺，赐额“志愿”。北宋初僧赞宁撰有《志愿寺碑记》，其中云：“志愿寺者，东晋邑人张延光舍宅之所构也。……白刺史为题名，章正字多遗迹。”^⑥ “白刺史”即杭州刺史白居易，“章正字”即章孝标。也就是说，据赞宁所载，白居易登临此山时，还为志愿寺题写寺名。在西山的对面东山，山上有顾况读书台。据《硤川续志》记载，顾逋翁（况，字逋翁）读书台，“在东山葛洪丹井西，有石倚空，顶平如台，山势环拥，青翠四周。唐顾况尝读书其上”^⑦。白居易在西山上远眺对面东山及硤石湖，追忆往事，思绪缱绻，留下《登西山望硤石湖》诗一首：“菱歌清唱棹舟回，树里南湖似鉴开。平障烟浮低落日，幽溪路细长新苔。居民地僻常无事，太守官闲好独来。犹记长安论诗句，至今惆怅读书台。”^⑧

① 潜说友纂修：咸淳《临安志》卷27，清道光十年（1830）钱塘汪氏振绮堂刻同治六年（1867）增刻本，第12页。

② 潜说友纂修：咸淳《临安志》卷27，清道光十年（1830）钱塘汪氏振绮堂刻同治六年（1867）增刻本，第12页。

③ 参见周祝伟：《唐代两浙州县职官考：历代方志所载唐职官新考补正》，上海古籍出版社，2019年，第146—148页。

④ 《大清一统志》及顾祖禹《读史方輿纪要》均以紫微山为硤石山，谓：“硤石山，即紫微山也。”而据明赵维寰《宁志备考》、清范襄《海宁县志略》及周广业《宁志余闻》等地方典籍考证，则认为硤石山是西山与东山的合称。似以后说为是。

⑤ 王德浩纂，曹宗载编：《峡川续志》卷1《山川》，“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台北成文出版社，1983年，第593号，第49页。

⑥ 王德浩纂，曹宗载编：《峡川续志》卷13《艺文·碑碣》，“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593号，第601—605页。

⑦ 王德浩纂，曹宗载编：《硤川续志》卷2《古迹》，“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593号，第77页。

⑧ 王德浩纂，曹宗载编：《硤川续志》卷16《艺文·诗》，“中国方志丛书”华中地方，第593号，第743—744页。按，此诗《白氏长庆集》未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丁如明、聂世美校点本《白居易全集》“补遗一”有录，第1007—1008页。

顾况，《旧唐书·顾况传》《唐才子传》等均称其是“苏州人”，《新唐书》也说是“吴人”，《至元嘉禾志》《明一统志》《大清一统志》则谓其“海盐人”。顾况本人也自认是苏州人。他曾撰《奉同郎中使君郡斋雨中宴集之什》，诗题即自衍“州民朝议郎行饶州司士参军员外置同正员顾况”，诗中有“况与数君子，列座分两楹。文雅一何丽，林塘含余清。我公未归朝，游子不待晴”^①。此“我公”即“郎中使君”苏州刺史韦应物。韦应物由尚书省左司郎中出任苏州刺史，故世有“韦苏州”“韦左司”之称。顾况此诗为韦应物名篇《郡斋雨中与诸文士燕集》诗的和诗。孙望《韦应物诗集系年校笺》定此诗于贞元五年（789）夏作于苏州刺史任内，并曰：“况之贬，宜在贞元五年三、四月之间矣。以况本苏州人，故于贬迁途中先返故里，奉和诗即既贬而返苏后所作，故自称州民云云也。诗之作在夏间，于时亦相符。”^②唐时官场重内官、轻外职，京官大多不愿外任，故顾况将韦刺史的“未归朝”与自己的受斥外贬“不待晴”两者并提。顾况既自称“州民”“游子”，则其家乡当时应属刺史韦应物治下的苏州海盐县。至元《嘉禾志》卷14《古迹·海盐县》载：“顾况宅，在（海盐）县西南五十七里横山禅寂寺寺侧，祠况为伽蓝神。况尝有诗云‘家住双峰兰若边’是也。”据考证，顾况卒年九十四，约在元和十五年（820）后。^③从时间上看，白居易长庆二年（822）七月十四日受命出任杭州刺史，因汴路不通，取襄汉路赴任，辗转水陆七千余里，到任时已是十月一日。^④此时，或许正值顾况去世抑或去世后不久。他到任理顺政务后，借“行县”之名前往访故缅怀致意，也是情理之中的事。不过，他的此访，仅限于也只能限于在杭州盐官县西山远眺缅怀致意而已，因为近在眼前的东山顾况读书台以及横山顾况故宅当时均属苏州海盐县境域。作为封疆大吏杭州刺史的白居易，自然不能违制越境前往苏州管辖下的海盐县境观览凭吊。

二 顾况对青年白居易的激赏延誉之功

顾况工诗，在中唐时期的诗坛具有很高地位，影响很大。时人评价其诗：“偏于逸歌长句，骏发踔厉，往往若穿天心、出月胁，意外惊人语，非寻常所能及，最为快也。李白、杜甫已死，非君将谁与哉？”^⑤他的这种地位和影响可以从两件事中得到充分反映。

第一件事是发生在顾况任职长安期间的一次家中雅集活动。贞元四年夏，顾况任秘书省著作佐郎，在长安宣平里的家中，与柳浑、刘太真、包佶等来访诸友聚会，相与唱和，“乃赋六言诗以纪会。既明日，属文之士翕然而和之。八音铿其盈耳，环堵烂而溢目。”^⑥其后赋诗结集为《诸朝彦过顾况宅赋诗》一卷。顾况宣平里家中的这次雅集唱和，可谓一石激起千层浪，竟产生全国轰动效应，“举国传览，以为盛观”^⑦。

第二件事是顾况贬任饶州司士参军途中在苏州刺史韦应物家中的宴饮雅集活动。贞元五年，顾况在贬任途中过访苏州刺史韦应物。韦应物组织宴集，有诗《郡斋雨中与诸文士燕集》。当天虽然下着雨，但在郡斋中嘉宾满堂，“鲜肥属时禁，蔬果幸见尝。俯饮一杯酒，仰聆金玉

① 孙望：《韦应物诗集系年校笺》卷9，中华书局，2002年，第427页。

② 孙望：《韦应物诗集系年校笺》卷9，第425页。

③ 参见赵昌平：《关于顾况生平的几个问题——与傅璇琮先生商榷》，《苏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4年第1期。

④ 参见丁如明、聂世美校点：《白居易全集》卷61《杭州刺史谢上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842页。

⑤ 皇甫湜：《皇甫持正文集》卷2《顾况诗集序》，宋蜀刻本唐人集丛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第40页。

⑥ 李昉辑：《文苑英华》卷716，明刻本，第4532页。

⑦ 刘太真：《顾著作宣平里赋诗序》，董诰等编：《全唐文》卷395，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第1777页。

章。神欢体自轻，意欲凌风翔。吴中盛文史，群彦今汪洋”^①。顾况撰《奉同郎中使君郡斋雨中宴集之什》，其中说“况与数君子，列座分两楹。文雅一何丽”^②。顾况一路西行，先后拜访杭州刺史房孺复、睦州刺史韦赞，两人都有和诗。到了信州，时任信州刺史刘太真也对韦应物《郡斋燕集》有和诗，诗题即云：“顾十二左迁过韦苏州、房杭州、韦睦州，三使君皆有郡中燕集诗，辞章高丽，鄙夫之所仰慕。顾生既至，留连笑语，因亦成篇，以继三君子之风焉。”^③随着顾况前往贬任途中一路拜访诸友，苏州宴集诗的轰动效应便像涟漪一般一波又一波地向外延展。

两次诗坛盛事，特别是近在咫尺的苏州宴集及其持续发酵引起的轰动效应，对白居易产生了深刻影响。苏州宴集之时，白居易正游于苏、杭二州。当时的他因年事尚浅无缘预会，但他对这次宴集活动钦慕之至，对能够组织如此宴集盛况的大州刺史尊崇地位更是钦羨至极，感触良深，以致37年后在苏州刺史任上还记忆犹新，而特撰《吴郡诗石记》以纪其事。

顾况诗名盛，文坛地位高，但性格傲岸。时人李肇《唐国史补》（卷中）说他，“傲毁朝列”。《旧唐书·顾况传》也说他，“能为歌诗，性诙谐。虽王公之贵，与之交者，必戏侮之。然以嘲谑能文，人多狎之”^④。因为眼光高，一般人因为诗文难入他的法眼，往往多遭其嘲谑而心生畏惧。然而白居易却是少有的例外，初到京师上门拜谒，即以一首《赋得古原草送别》诗受到他的赏识和奖掖。唐人张固在其《幽闲鼓吹》中记述这对师生初次见面的传奇情形：

尚书白居易应举，初至京，以诗谒著作顾况。况睹姓名，熟视白公曰：“米价方贵，居亦弗易。”乃披卷，首篇曰：“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却嗟赏曰：“道得个语，居即易矣。”^⑤

因为之延誉，声名大振。《新唐书·白居易传》则载称：

（白）居易敏晤绝人，工文章。未冠，谒顾况。况，吴人，恃才少所推可，见其文，自失曰：“吾谓斯文遂绝，今复得子矣！”^⑥

自此之后，在顾况这个伯乐的激赏和宣传下，原本藉藉无名的白居易迅速声名雀起，并在恩师顾况指点下学业精进。贞元十六年（800），时年29岁的白居易，“以进士举一上登第”^⑦。在“三十老明经，五十少进士”的唐代科场，29岁即高中进士的白居易可谓春风得意。22年后已出任杭州刺史的白居易，于到任后次年即长庆三年（823）秋八月来到毗邻顾况家乡的盐官县西山，登山远眺，感恩致意，凭吊缅怀。

① 孙望：《韦应物诗集系年校笺》卷9《郡斋雨中与诸文士燕集》，第424页。

② 韦应物撰：《韦刺史诗集》卷1，四部丛刊景明嘉靖本，第6页。

③ 彭定求等编：《全唐诗》第4函第8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第638页。

④ 《旧唐书》卷130《顾况传》，中华书局，1975年标点本，第3625页。

⑤ 有关这次谒顾活动，学界虽有不同意见，但许大畅先生《白居易未仕前经历浅探》一文已作较详实考证，可参阅。

⑥ 《新唐书》卷119《白居易传》，中华书局，1975年标点本，第4300页。

⑦ 丁如明、聂世美校点：《白居易全集》卷46《箴言并序》，第658页。

三 白居易对顾况文学主张与诗歌风格的继承发扬

晚唐张为撰《诗人主客图》一卷,以白居易、孟云卿、李益、鲍溶、孟郊、武元衡为主,每主之下有“升堂”“入室”“及门”之别,均为客。其中以白居易为广大教化主,而以顾况为升堂,将俩人归为同一个诗派。^①某种程度上也揭示了他们二人之间在诗歌方面的渊源关系。

顾况一生,经历盛唐与中唐两个时期。其诗歌将李白的浪漫主义与杜甫的现实主义集于一身,在以淡泊寂寞为主流基调的大历诗风中,显示出异于同辈的鲜明艺术个性。虽然他也有一些诗歌,奇峻深曲,峭拔恣纵,气势雄大,充满着浪漫主义的色彩,如《庐山瀑布歌送李顾》诗,其中“飘白霓,挂丹梯。应从织女机边落,不遣浔阳潮向西。火雷劈山珠喷日,五老峰前九江溢”^②之类豪迈雄奇、想象丰富、夸张大胆的描写,但他更多的诗歌则是充满着现实主义情怀。从其诗歌的艺术风格来看,顾况可以说是上承杜甫、下启白居易,对白居易有着深刻的影响。

(一) 白居易对顾况文学主张的继承和发展

因不满于南朝以来诗歌讲求“隶事”“藻绘”,以用典繁富、词藻华丽为美而形成靡丽之赋和劝百讽一的流习和现状,顾况强调诗歌要反映现实、服务社会,注重诗歌讽谕教化功能。他在《悲歌》序中说:诗,乃“理乱之所经,王化之所兴。信无逃于声教,岂徒文彩之丽耶?遂作歌以悲之”^③。主张恢复古代的采诗制度,发扬《诗经》讽谕时事的传统,并曾仿《诗经》撰作《上古之什补亡训传十三章》,其中《采蜡一章》:“采采者蜡,于泉谷兮。煌煌中堂,烈华烛兮。新歌善舞,弦柱促兮。荒岩之人,自取其毒兮。”^④他不仅仿用“古题”以创新作,而且还创作了极具现实意义的新题乐府如《公子行》:

轻薄儿,面如玉,紫陌春风缠马足。双镫悬金缕鹊飞,长衫刺雪生犀束。绿槐夹道阴初成,珊瑚几节敌红星。红肌拂拂酒光凝,当垆背拉金吾行。朝游冬冬鼓声发,暮游冬冬鼓声绝。入门不肯自升堂,美人扶踏金阶月。^⑤

他的乐府诗不避俚俗,不乏尖刻,直接揭露现实,其中以《困一章》最为著名。全诗悲愤地揭露了困的悲惨境遇和官吏残害人民的深重罪行。

白居易继承顾况的文学主张,积极倡导诗歌革新运动。他正式提出“新乐府”概念,并撰作《新乐府》50篇。在《新乐府序》中,他阐明宗旨说:“其辞质而径,欲见之者易谕也。其言直而切,欲闻之者深诫也。其事核而实,使采之者传信也。其体顺而肆,可以播于乐章歌曲也。总而言之,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不为文而作也。”^⑥在《与元九书》中,更是概括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⑦的主张。从他的作品中,可以很清晰地看到与顾况诗歌之间的一脉相承,如顾况创作有《采蜡》,白居易则有《捕蝗》;顾况有《困》,白居易则有《杜陵叟》《卖炭翁》《新丰折臂翁》;顾况有《公子行》,白居易则有《轻肥》;顾

① 参见李调元:《〈诗人主客图〉序》,张为:《诗人主客图》,清广汉钟登甲乐道斋仿万卷楼刻函海本,第1页。

② 参见顾况:《华阳集》卷中,四库唐人文集丛刊,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28页。

③ 顾况撰:《华阳集》卷中《悲歌序》,四库唐人文集丛刊,第25页。

④ 顾况撰:《华阳集》卷中,四库唐人文集丛刊,第17页。

⑤ 顾况撰:《华阳集》卷中,四库唐人文集丛刊,第29页。

⑥ 丁如明、聂世美校点:《白居易全集》卷3《新乐府并序》,第35页。

⑦ 丁如明、聂世美校点:《白居易全集》卷45《与元九书》,第649页。

况有《行路难》，白居易则有《海漫漫》，等等。顾况效法《诗经》“小序”，取诗中首句一二字为题，揭明主题，如《困一章》，“困，哀闵也”^①。又如《采蜡一章》，“采蜡，怨奢也”^②。这种开宗明义的做法，同样也被白居易所继承，成为他撰《新乐府》“首章标其目”的先声。白居易既继承顾况的文学主张，使诗歌作品充满讽谕批判精神，因而也就不可避免地经受着相似的境遇。顾况“不能慕顺，为众所排”^③，白居易同样也因“但伤民病痛，不识时忌讳。……贵人多怪怒，闲人多非訾”，使得“权豪贵近者相目变色”，“执政柄者扼腕”，“握军要者切齿”，竟至“言未闻而谤已成”^④。尽管白居易性格阴柔，在毁谤面前他不像顾况那样狂狷傲岸以傲硬碰，表现出的是韧的一面，但他同样坚守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坚持做到不为所动，不愿枉道曲行，“唯歌生民病，愿得天子知”^⑤，“惟有唐衢见，知我平生志”^⑥，创作大量反映民间疾苦、揭露统治特权阶层骄奢淫逸为非作歹、讽谏皇帝推行仁政的诗歌作品。

（二）白居易继承发展顾况诗歌的尚俗风格

顾况的一些诗歌，特别是乐府诗，不避俚俗，方言俚语，质朴浅显，通俗易懂。他是唐代第一位把原先仅仅流行于民间的竹枝词引入诗歌进行创作的文人，今存有《竹枝曲》一首。他有的诗歌近乎白话，如《杜秀才画立走水牛歌》：“昆仑儿，骑白象，时时锁著师子项。奚奴跨马不搭鞍，立走水牛惊汉官。江村小儿好夸骋，脚踏牛头上牛领。浅草平田擦过时，大虫着钝几落井。杜生知我恋沧州，画作一障张床头。八十老婆拍手笑，妒他织女嫁牵牛。”^⑦再如《梁司马画马歌》中亦有“此马昂然独出群，阿爷是龙飞入云”^⑧。其中的“阿爷”，纯属是民间口语。他的诗歌还直接化用民间谚语，如《赠别崔十三长官》的首句即“真玉烧不热，宝剑拗不折”^⑨，《行路难三首》中也有“凡物各自有根本，种禾终不生豆苗”^⑩，均平白如话，通俗易懂。而白居易则在“俗”的道路上走得更远，以致在后代诗歌史上甚至被冠上“白俗”的名号和标签。据载，白居易为了使自己的诗浅显易懂，“每作诗，令一老姬解之。问曰：‘解否？’姬曰解，则录之；不解，则易之”^⑪。唐宣宗李忱曾写挽诗赞白居易的诗：“童子解吟长恨曲，胡儿能唱琵琶篇。”^⑫他自己也曾自述他的诗歌流传之广：“自长安抵江西三四千里，凡乡校、佛寺、逆旅、行舟之中，往往有题仆诗者。士庶、僧徒、嫖妇、处女之口，每每有咏仆诗者。”^⑬元稹在《白氏长庆集序》中也曾说，“予尝于平水市见村校诸童竞习诗，招而问之。皆对曰：‘先生教我乐天、微之诗。’固亦不知余之为微之也”^⑭。白居易被奉为“广大教化主”，是实至名归的。

① 谢维新编：《事类备要》前集卷24《亲属门》，清文渊阁《四库全书》本，第291页。

② 顾况撰：《华阳集》卷中，四库唐人文集丛刊，第17页。

③ 皇甫湜：《皇甫持正文集》卷2《顾况诗集序》，宋蜀刻本唐人文集丛刊，第41页。

④ 丁如明、聂世美校点：《白居易全集》卷45《与元九书》，第649页。

⑤ 丁如明、聂世美校点：《白居易全集》卷1《寄唐生》，第10页。

⑥ 丁如明、聂世美校点：《白居易全集》卷1《伤唐衢二首》，第11页。

⑦ 顾况撰：《华阳集》卷中，四库唐人文集丛刊，第27页。

⑧ 顾况撰：《华阳集》卷中，四库唐人文集丛刊，第30页。

⑨ 顾况撰：《华阳集》卷上，四库唐人文集丛刊，第20页。

⑩ 顾况撰：《华阳集》卷中，四库唐人文集丛刊，第24页。

⑪ 释惠洪：《冷斋夜话》卷1《老姬解诗》，中华书局，1988年，第17页。

⑫ 李忱：《吊白居易》，彭定求等编：《全唐诗》第1函第2册《宣宗皇帝》，第31页。

⑬ 丁如明、聂世美校点：《白居易全集》卷45《与元九书》，第650页。

⑭ 元稹著，冀勤点校：《元稹集》卷51，中华书局，1982年，第555页。

四 白居易对顾况故人李泌、皇甫湜的特殊情谊考析

在顾况一生中,从现存史料可见受其慧眼识珠、激赏延誉而具师生情谊的晚辈,有白居易和皇甫湜二人。不过,无论是白居易还是皇甫湜,都罕有留下与顾况直接交往的诗文资料。述及白居易与顾况交往的,仅有唐人张固《幽闲鼓吹》及新、旧《唐书》白居易本传所载史事,以及白居易自撰《登西山望硤石湖》诗和宋僧赞宁所述硤石紫微山上的“白刺史题名”。而皇甫湜与顾况交往的诗文资料同样也很少,仅见之于皇甫湜所撰《顾况诗集序》。皇甫湜在这篇序文中自述与顾况的师生情谊:“湜以童子见君扬州孝感寺。君披黄衫,白绢鞞头,眸子了然,炯炯清立,望之真白圭振鹭也。既接欢然,以我为扬雄、孟子,顾恨不及见。三十年于兹矣,知音之厚,曷尝忘诸?”^① 顾况对少年皇甫湜的赏识和“知音之厚”,皇甫湜30年来未尝稍忘,但却是深埋心底而未尝诉诸文字。顾况之子顾非熊携乃父诗集20卷远赴襄阳,“泣请”皇甫湜为序“发之”,从中亦可足见顾非熊深知乃父与皇甫湜之间非同一般的情谊。皇甫湜与顾况之间的这种情感模式,似乎也同样复刻在白居易与顾况之间。不知这是否与顾况为人怪诞、洒脱不羁、不能慕顺的个性有关?还是与其晚年归隐之状态有关?不过,白居易、皇甫湜与顾况之间的这种若即若离、似淡实浓的情谊,恰恰契合顾况在《送李侍御往吴兴》诗中所呈现的那种“世间只有情难说,今夜应无不醉人”^② 的行事风格,又抑或是白居易在《琵琶行》中所说的那种“此时无声胜有声”的情感表达方式。

在顾况的少数好友之中,李泌是至为知己的一位。《旧唐书》载:“泌流放江南,与柳浑、顾况为人外之交,吟咏自适。”^③《唐才子传》卷3《顾况》载:“况素善于李泌,遂师事之,得其服气之法,能终日不食。”两人之间,堪称亦师亦友。顾况有《送李泌》诗:“昔别吴堤雨,春帆去较迟。江波千里绿,□□□□□。”^④ 李泌在大历、兴元间任杭州刺史,史载“以理称”^⑤。其在杭州刺史任上,引西湖水入城为六井,大为民利。李泌于贞元五年去世,此时的白居易尚未科举及第,也未见俩人有交集之处。不过,也许是一种缘分,近40年后白居易也得以于长庆二年来到杭州出任刺史。自称“三年为刺史,无政在人口”^⑥ 的白居易,再绍箕裘,遵循并弘扬光大乃师顾况的师友李泌治理杭州事业。《新唐书·白居易传》载称:“(白居易)始筑堤捍钱塘湖,钟泄其水,溉田千顷。复浚李泌六井,民赖其汲。”^⑦ 而《西湖游览志》则更是直接说:“长庆间,白居易纘邳侯之绩而浚治之,民以为利。”^⑧ 白居易还在所立《钱塘湖石记》碑中谆谆教导后人:“其郭内六井,李泌相公典郡日所作,甚利于人。与湖相通,中有阴窞,往往堙塞,亦宜数察而通理之。则虽大旱,而井水常足。”^⑨ 冀望后人铭记李泌功业,不废其绩,不枉其心。

与白居易和李泌之间的隔代缘相较,白居易与皇甫湜之间的关系和情感似更为复杂。两人虽

① 皇甫湜:《皇甫持正文集》卷2,宋蜀刻本唐人集丛刊,第41页。

② 洪迈编:《万首唐人绝句诗》卷29,明万历刻本,第239页。

③ 《旧唐书》卷130《李繁传》,中华书局,1975年标点本,第3624页。

④ 顾况撰:《华阳集》卷中,四库唐人文集丛刊,第35页。

⑤ 《旧唐书》卷130《李泌传》,第3622页。

⑥ 丁如明、聂世美校点:《白居易全集》卷8《三年为刺史》,第104页。

⑦ 《新唐书》卷119《白居易传》,第4303页。

⑧ 田汝成纂修:《西湖游览志》卷13,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第164页。

⑨ 丁如明、聂世美校点:《白居易全集》卷68《钱塘湖石记》,第941页。

都受顾况赏识奖掖而有顾门之谊，但性情不同、文学见解异趣。白居易年长皇甫湜5岁，性格柔顺，而皇甫湜性情颇类顾况，恃才傲物，倜傥不羁。据载，皇甫湜因“辨急使酒，数忤同省，求分司东都”，被东都留守裴度辟为判官，“度修福先寺，将立碑，求文于白居易。湜怒曰：‘近舍湜而远取居易，请从此辞。’度谢之。湜即请斗酒，饮酣，援笔立就。度赠以车马缿彩甚厚。湜大怒曰：‘自予为顾况集序，未尝许人。今碑字三千，字三缣，何遇我薄耶？’度笑曰：‘不羁之才也。’从而酬之”^①。白居易虽年长于皇甫湜，皇甫湜却心高气傲，不甘居于白居易之下，在俩人近30年的交往和友谊中，我们看到更多的是白居易对皇甫湜施援、呵护和亲爱。元和三年（808），皇甫湜因制科应试，与牛僧孺、李宗闵一道直言时政得失，无所避忌，而得罪权贵，被斥逐为关外官陆浑尉。身为谏官的白居易不畏强权挺身而出，作《论制科人状》为其转圜并打抱不平，虽无果，但足见其情切。白居易还写过《寄皇甫七》（皇甫湜行七）：“邻女偷新果，家僮漉小鱼。不知皇甫七，池上兴何如。”又有《访皇甫七》：“上马行数里，逢花倾一杯。更无停泊处，还是觅君来。”^②皇甫湜死后，白居易更是难抑悲痛，写下《哭皇甫七郎中湜》：“志业过玄晏，词华似祢衡。多才非福禄，薄命是聪明。不得人间寿，还留身后名。涉江文一首，便可敌公卿。”白居易自注：“持正奇文甚多，《涉江》一章尤出。”^③对于皇甫湜的恃才傲物、命薄不寿，白居易虽多叹息，但却异常宽容，称赏揄扬至极。

结 语

综合以上考察分析，青年白居易得顾况激赏奖掖而有知音之交、师生之谊，对顾况的文学主张和诗歌风格都作继承并发扬光大，甚至爱屋及乌对顾况师友也有着别样的深情厚意。在晚年出守杭州时，年逾五旬的白居易还借“行县”之名亲赴盐官县硤石，登临西山，隔境眺望近在眼前却属邻州苏州海盐县的顾况读书台、横山草堂等故迹，以慰缅怀之情。白居易与顾况之间，虽因为后者为人傲岸的个性特点、傲毁朝列为众所排的政坛人事、遁世隐居的生活状态等诸多因素，彼此交谊不宜于口而深藏于心，隐而不彰。但是，白居易对于顾况的情谊，正如皇甫湜所说的，数十年间，“知音之厚，何尝忘诸？”白居易对于顾况，无论是其人还是其学，都是情深义重、一脉相承的。

（作者单位：浙江省地方志工作办公室）

本文责编：杨卓轩

^① 《新唐书》卷176《皇甫湜传》，第5267—5268页。

^② 以上二首均见丁如明、聂世美校点：《白居易全集》卷23，第356页。

^③ 丁如明、聂世美校点：《白居易全集》卷28《哭皇甫七郎中湜》，第435页。